

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唐晓峰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新订版序言

我喜欢地理学在思想上的丰富性、文化上的丰富性，从远处说，它是文明成就的一种，从近处说，它贴近人心，贴近生活。琢磨这些问题，既能满足学术兴趣，也能增加文化乐趣、生活乐趣。

地理知识是一种素材，是科学的素材，也是思想文化的素材，不在思想文化方面用功，是丢掉了地理学的半壁江山。在我国目前的地理学界，多数人都在钻研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这是基础建设的需要，没错。但从长远来说，地理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会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兴趣所在，它的大众性更强。

在学习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听到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开始不明白，想了半天，“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随后，你用几句通俗语言做了解释。在这个瞬间，你已经把学术概念转换成通俗语言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领悟。当然也有相反的过程，普通人说了一件事情，学问家听了听，会说（例如）：“你讲的就是福柯提出的 discourse。威权通过 discourse 而自我实现。”很多学者喜欢这个过程。我却喜欢前面那种过程，写随笔，就是品味那种心得。

人文地理的话题，是常写常新的，因为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在变、眼光在变，一代人取代一代人，后浪推倒前浪，会有意料不到的主题出现。而我们的古老大地，对无论怎样的“新新人类”，

都是厚载不弃的，大地之宽容会是永恒的话题。当然，如果有谁不顾大地的脾气禀性，胡作非为，大地也会是不客气的。

《人文地理随笔》的第一版是二〇〇五年发行的，现在过去了十来年，老友吴彬提出修订一下再版。我于是复查了一下原来的篇目，感觉有些话题比较死板，有些篇目比较学院气，不适于放在“随笔”名下，于是拿掉。另外，近些年又有些新写的篇目，正好趁这个机会加进来，这样就形成了这本《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本书中的短文曾分别在《中国国家地理》《读书》《书城》《社会学家茶座》等刊物上发表，因为时间过了很久，已不易一一查清它们发表的时间了，请读者见谅。

唐晓峰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于五道口嘉园

新订版序言 1

一

中国最早的地理记录 2

“断代”工程与“断地”工程 5

大禹治水传说的新证据 8

中国的“两河文明” 12

山脉与历史 16

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 29

古代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 34

民族与地域 38

“边缘”的价值 41

“文明老区”行 44

二

翻越中条山 50

垣曲有座博物馆 53

南风歌 58

闯出山西 63

山东地区与华夏文明 67

寇准与巴东 71

西南首善 75

玉石传奇 79

澳门 黑沙 白玉环 83

天子之南库 87

三

观天文，察地理 92

中国古代的“神文地理” 96

泥里金龙 102

“墓大夫”的事业 106

古代的“数字”地理 110

人文地理大界线 113

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地理认同 117

环境狂想曲 125

山中无老虎 128

四

风从四方来 134

歌唱自然的时代 137

含咀山水之英华 141

大块文章 144

地可以怨否 147

家乡情怀 150

地远车疾 153

穷家富路 157

五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身世” 162

行年二十，步行三千 172

时代遗情 176

毛泽东的革命地理 179

兵家地理 183

中国地图上的长城 191

地图与人 195

“如何用地图扯谎” 199

梵蒂冈的地图画廊 203

六

“瓦子”与城市 212

城市的“商”态环境 215

虚拟世界 218

人居的都市 221

都市大街 224

时尚地理 230

宠物景观 234

休闲之美 238

生活地理：地点、场所 242

历史的视窗 251

回望自行车时代 254

工业遗产 258

陌生的城市 262

城市纪念性小议 265

老北京 270

访谈录：近代北京城如何脱离传统 275

七

环境的起源 290

名分问题 297

目 录

- 长城内外是故乡 305
- “边地”的主体性与多元性 313
- 人文疆界 328
-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337
- 原生态社会 345
- 城市包围农村：台湾观感 356

八

- 现代语境下的徐霞客 366
-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379
- “我最热爱的是中国” 388
- 泽林斯基的《美国文化地理》 399
- “天涯共此时”
- （附《大卫·哈维：当代人文地理学家
中的思想者》） 405



中国最早的地理记录

——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

一百多年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铺常卖的“龙骨”上识出文字，从而掀开以甲骨文（卜辞）研究历史的新阶段。甲骨文的发现，与竹简帛书、敦煌文书、故宫档案的发现，并列为二十世纪我国历史文献的重大发现。一九九九年八月，在甲骨文主要出土地安阳，举行了庆祝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面对甲骨文的古拙，文辞的简略，我们很容易会小看了使用这种文字的人，进而小看了商代文明，这是不当的。考古学与古文献学研究证明，商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文化已有很高的水平，原来怀疑是晚出的东西，不少都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了存在的证据，如干支的使用。现已发现的十几万块甲骨卜辞材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可观，其中地理一项，所含信息不少，可以说是中国地理知识记录史的第一篇。

首先，有地理知识就得有地名，很难设想没有地名的地理知识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大地的利用越充分，地理知识积累得越多，出现的地名也就越多。现在所发现的甲骨文，仅仅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就已经有上千地名。而商代必然还有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只是没有保存到今天）与更为丰富的口头语言，所以商代实际使用的地名应当更多。

地名主要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它所体现的是大地上人文活动的积累。大量地名的出现，说明卜辞记录的有关人与“地”的事很多。学者们按地追踪，发现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相当大。如商王在都城殷（今河南安阳）命人贞卜，对象可以是太行山另外一侧某国的安危，也可以是陕西泾渭地区某国的凶吉。而“鬼方”“土方”“夷方”“土方”“羌方”等，则代表了更为遥远的人文地理区位。

当然，甲骨文中许多地名已成为死字，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笔画样子，却读不出字音来，更不知是指哪块地方。它们是被历史淘汰了的文字，从而也终止了对它们所代表的地点的记忆。不过，甲骨文中也有些地名竟沿用到了今天，像洛、洹、沁、淄等。洹，就是洹字的老祖先。从洹到洹，形式上变了不少，但意思还是一样，这正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一个小证据。

甲骨卜辞证明商代有异地同名现象，原因是地名源于族名，如戈族住的地方就叫戈，共族住的地方就叫共。如果戈族搬到



商代甲骨刻辞拓本，内有“洹”水一名

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新的地方还叫戈。这个现象说明了文明早期人文地名起源的一个重要特点。

甲骨文的地名中有自然的山河名称，有多样的风向说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的东西。史学家称早期模糊的记载为“史影”，那么，在支离残缺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人文的“史影”，也有人文的“地影”。对人文的“地影”，卜辞专家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都进行过研究推断，使我们对商代的人文地理态势，有了稍微具体的认识。卜辞中最常见的人文地理内容有城、邑、边鄙（郊区）、商王的田猎区、四土、邦方（方国部族）等，这些东西构成了商代人文地理的主要框架。

甲骨文材料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大地域国家的早期特征，而国家领土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类问题。中国古代常说“王畿千里”，“王畿”可以理解为“中央”，国土若超过了一千里，就有了“地方”。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机器要建立一套管理控制大地域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中央”管控大量“地方”的办法，地理的政治内容因此出现。

商代所谓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王玉哲先生曾提出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看法：商代的国土不是一个弥合的整体，而是以都城（大邑）为中心，四周远近散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在这些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存在着不听命于商朝甚至与商朝敌对的小方国，就是说，商朝的国土是疏而有漏，这是早期大地域国家的政治地理形态。这种疏而有漏的形态，到了秦汉高度集权的帝国时代，则是不被容忍的东西了。

“断代”工程与“断地”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在断定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准确时间，意义非常重大。作为地理从业者，我们称道断代研究的同时，又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桩重要的事，即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地理空间问题，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否也做一回夏商周“断地”工程。

理论上我们把时空分开，但事情的时空属性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发生”一词在英文作“take place”，直译是“找一处地方”。这个词用得好的，文明发生时，要找一处地方。文明的发生到底在哪里？文明的发展壮大又先后朝着哪些地理方向？文明的地盘又是如何向四面步步壮大？这些都需要做“断地”研究。而这些“地”若与“代”挂起钩来，我们的文明发生问题就更加清晰明白了。

对于中华文明的空间地域问题，历来有各种说法，混乱之状并不亚于“代”的问题。在王朝时代，生长在“文明”地域的冠带士子骄傲得很，以为泱泱华夏在舜爷、禹爷的时代，就南抚交趾、北定山戎、西抵渠羌、东尽鸟夷，“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到了蛮夷的地方）。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带头澄清了这个问题，提醒人们文明不可能一下子就坐出一片大地盘，疆域只能是渐渐大起来的。

但是，后来又有人把早期朝代的地盘尽量地压缩，压到小得

可怜。比如说商朝，不过是一个以安阳为中心的“统治家族”，是个极为一般的“城邦小国”。按照城邦小国的思路去想，商朝地域范围怎么也宽广不起来。可是，我们明明读过商朝后人缅怀祖先的诗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我们又明明在距离中原近千里以远的湖北黄陂看到典型的商代城址。

那么，我们文明历史上这个光辉的奠基时代，即夏代、商代、周代时期的疆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是相当重要却又相当难断的问题。在三代以后的朝代，都设立了一套郡（州）县制度，疆域内分布着密密麻麻的郡县名称，它们大多方位记载明确，以它们为定位点，可以做很细致、很实在的古代地理研究。可是在三代时期，没有（或者说没有记载下来）如此密集准确的地名供我们方便地使用。欲恢复三代地理的本相，需要配合其他办法，诸如考古学、古文字学等。

在传世及出土的卜辞金文中，有不少三代的地名，如果将它们仔细落实，再结合许多文化遗址，可以大大增进对三代历史地理的了解，明确它们的疆域范围。另外，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频频令我们吃惊，不少原以为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忽然挖出精美陶玉，现出庄严鼎彝。对我国早期文明的足迹之密、放形之远，学者们又越来越不敢低估了。一些在“想不到的地方”所发现的重要遗址，都引发我们认真地去想一想：它们在古代文明大地谱系中曾占据怎样的坐标、具有怎样的人文地理属性？

由考古新材料所导致的历史地理观念的变化，几乎是“七八年来一次”。过去关于文明的“摇篮”即文明地理重心的理解，还

是一元式的，只认黄河中游这一个“摇篮”，尽管其他地方也有另外类型的文化，但不称它们是“摇篮”。现在，只有一个摇篮的理解已经说不通了，因为考古研究显示，在东北、东南、西南都有强大原始文化存在，说明我们的文明最终是由众多摇篮培育起来的。

至于夏商周三代的地理问题，事实与观念也在丰富更新，除了落实新的地名定点、确认地域关系，还有如何认识早期朝代疆域总体形态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将王朝领土想象成连续弥合的，但有专家尖锐地指出，早期国家的领土可以是插花状的。另外，对距都城远近不同的领土，势必存在不同的管理控制方式，如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别，这在早期国家地域机制中有什么意义？此外，“四夷”地带的重要性不能忽略，三代时期是开放型疆域，那是一个大融合时代，在四夷地带照样埋伏着华夏文明的基因火种。

大禹治水传说的新证据

二〇〇二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叫鬯公盃，其内底的一篇九十八字的铭文，引起学术界的震动。铭文劈头便讲：“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撇开铭文的其他重要内容不论，仅这十来个字，就送到了中国古代地理的一桩大事，即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每个中国人熟悉的一个历史传说，大概在小学课本中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就完事了，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这件事为标志的。



鬯公盃

大禹治水后，他所行经的地方，被称作“禹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变得文明，没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蛮世界，所以“禹迹”就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因为“九州”说出了一套地理分区体系、一个大范围的地理格局。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



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时期大禹像拓本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文献中多有记载，而最经典的历史文本是《尚书》中的《禹贡》篇。在王朝历史时期，《禹贡》属于儒学经典，备受尊崇，人们笃信大禹治水、分画九州是事实。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王朝体系崩溃，旧学沦落，新思潮涌现。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传说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指出传世文献记录的东西不是那么可靠，于是纠正了不少对早期历史的误传。关于大禹治水这件事，传世文献的记载受到怀疑，而确凿的证据只有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底是什